

# 社会资本视角下城市居民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南方<sup>1</sup>,罗微<sup>1,2</sup>

(1.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北京 100875;2.山东财经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济南 250014)

**[摘要]** 普通公民的捐赠行为已成为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宏观社会背景下分析公民的个人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会对促进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采用中国公民公益行为全国抽样调查中的相关数据,依据社会资本理论,考察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对城市居民捐赠行为的影响。发现在控制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区居住时间、生活幸福感、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社区服务等变量后,居民的捐款行为会受到其个人社会资本存量的影响。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两方面的社会资本对于人们捐款行为有正向作用;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社会关系更多的居民,其捐款的优势更高;随着居民社会信任得分(包含信任社区干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帮助社区里的其他人三个方面)的增加,其捐款优势也明显提高。

**[关键词]** 社会资本;捐款;社会网络;社会信任

**[中图分类号]** D6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13)03-0121-08

## 一、引言

中国的慈善事业进入新世纪后迎来了“飞跃期”。2001—2010年国内慈善捐赠总额和接收社会捐赠总额占GDP的比重都增速明显。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公民社会组织的日益成熟,中国公民人均捐赠额总体呈现逐年递增的发展趋势,人均捐款额从2001年不足1元,增长到2010年人均捐款44.87元,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0.89%(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中心,2012,第45页)。普通公民的捐赠行为,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于普通公民个体捐赠行为的研究,也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相比于国际上建立的比较成熟的个人公益行为监测体系和基于大规模调查进行的众多实证研究,中国在公益慈善领域基于相对较大样本开展的实证研究屈指可数,仅有2001年丁元竹在国内六省的一次2000份问卷的随机抽样调查,以及2010

年张网成的“中国公民志愿服务调查”(丁元竹、江汛清、谭建光,2007;张网成,2011)。还有一些在南京、北京、厦门等地开展的地方性研究(陈茗、林志婉,2004;梁莹,2009)。这些研究将关注点主要放在志愿服务上,初步描述出中国公民志愿行为的整体状况。其中张网成的研究也关注到公民捐款行为的特征,并就影响捐款行为的因素进行了简要分析,发现年龄、性别、学历、收入和对社会的信任度等均会对其捐款行为产生影响,这些发现对进一步开展公民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社会资本理论的领军人物罗勃特·普特南认为,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利用社会资本的研究来观察个人慈善行为和志愿服务的趋势有重大意义(Putnam, 2001)。另外,社会资本理论不仅对社会成员行动的动因有更深入的解释,而且还能有效地把微观层次的个人选择与宏观层次的集体和社会选择加以结合(张广利、陈仕中,2006),这对在宏观社会背景下研究公

**[收稿日期]** 2012-07-13

**[基金项目]** 北京师范大学985工程项目“公共安全政策与社会稳定法治保障”。

民个体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

国际学术研究表明,个体的社会资本存量会对其捐款和参加志愿服务有显著影响(Schervish & Havens, 1997; Mesch, Rooney, Steinberg, Denton, 2006; Brown & Ferris, 2007; Wang & Graddy, 2008)。然而,国外研究中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是基于西方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而目前中国学术界尚未有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中国公民捐款行为的相关研究。

本研究力图将中国公益慈善和社会资本建立关联,第一次尝试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和估量指标,探索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对其捐款行为的影响。希望该研究为中国学术界进行城市居民捐款行为研究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并为把握城市居民捐款行为的趋势、推进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 二、文献回顾

### (一)社会资本的主要理论框架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现实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包亚明, 1997)。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指出社会资本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这些实体是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提供便利。另一名社会资本领域的关键性人物普特南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能够促进社会信任,更重要的是,社会信任、互惠规范与网络互相加强,最终形成自愿合作,解决集体行动困境(Putnam, 1994)。

综合上述几位社会资本领域关键人物的观点可以发现,社会资本至少包含了三种基本形式:信任、网络和规范。信任被认为是对他人期望可靠性的感知和解释,基于共享的规范,出现在一个社区,对他人协作行为的相互期望。而作为获取信息和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不管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必须建立在互惠和信任准则之上(赵家章, 2011)。规范则是信任和互惠的规范,大都约定俗成。这些非正式规范是处在关系网络中的个人或组织在频繁的接触、交流与交易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对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取向起着重要的约束作用(Coleman, 1988)。

社会资本的分析层次可归纳为关注个体社会网络资源的微观层次;关注网络结构形成及资源网络分配的中观层次,以及关注社会资本如何嵌入较大的政治经济系统或文化与规范系统的宏观层次(Putnam, 1994; 张文宏, 2003; 胡涤非, 2011)。本研究重在关注城市居民个体捐款行为的影响因素,因此,仅从微观层面对个体的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和分析。

###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

社会资本的研究中,还没有形成学界一致认可的测量指标。学者们根据对社会资本定义和层次的不同理解,制订出不同的指标来测量社会资本。综合比较社会资本测量研究所使用的维度可以发现,信任水平、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源是三个比较常用的测量个人社会资本的维度,而每一个维度选取的具体指标则结合研究者的具体研究情境进行了相应设置。

1. 信任水平的测量。很多研究都把信任作为测量社会资本水平的代理变量,已经连续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开展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就采用了这样的方式(万俊毅、秦佳, 2011; 赵家章, 2011)。WVS调查中,个人信任特征包括了对他人的信任、对制度的信心、对道德规范和贪污的态度几个指标。

2. 关系网络的测量。关系网络是测量社会资本另一个常用的指标,主要体现在网络规模、相似度、紧密度和中心度四个方面的测量。关系网络的相似度是测量个人与网络成员的同质性程度;紧密度是衡量网络成员间相互联系的程度;中心度的测量方法就是个人与其他社会成员间关系的数量,一般称为个体的度(夏瑛, 2007)。

3. 社会资源的测量。社会资源测量集中于个人在其网络和关系中所汲取其他人拥有的有价值资源(例如财富、权力和地位),这典型地反映在关系人的职业、权威位置、工作部门或收入等指标中(尉建文、赵延东, 2011)。

### (三)社会资本对个人捐款行为的影响

如普特南指出,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观察个人慈善行为和志愿服务有重要意义。国外针对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测量指标的研究汗牛充栋,但真正有关社会资本与个人慈善行为的关系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直到近几年才引起学者的关注。

有研究发现,非正式的助人行为、参加社会组织以及个人参与社会活动的行为和资源,都对其捐款行为有显著影响(Schervish & Havens, 1997)。还有研究将个体的社会网络和基于信任的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测量指标后发现,无论是出于宗教原因的捐款,还是非宗教原因的捐款,那些社会关系更多、广泛参与社会活动的人,以及更加信任别人的人,越有可能捐出更多的钱(Brown & Ferris, 2007; Wang & Graddy, 2008)。

国内关于捐款行为的研究发现,个人社会信任度的高低与其捐赠率的高低成正相关(张网成, 2011)。但这仅仅是从社会资本的一个方面来说明社会资本与捐款之间的关系,采用描述频数分布得出结论,没有做显著性检验,也没能有效地控制其他混杂因素的影响。

综上,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分析人们的捐款行为是一项有重要理论及实践意义的研究。国外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揭示了社会资本对捐款行为的影响,而国内目前还缺乏相关研究,特别是基于大规模个体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 三、研究假设与数据

#### (一)研究假设

依据社会资本理论以及国外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的假设为:社会资本与居民的捐款行为呈正相关关系,即社会资本越强的居民,其捐款的可能性越大。

具体来讲,根据本文自变量选择情况(见变量测量部分),上述假设包括如下两个分假设:

1. 社会网络维度的社会资本越多的城市居民,捐款可能性越大;
2. 社会信任得分(见变量测量部分)越高的城市居民,捐款的可能性更大。

上述假设关系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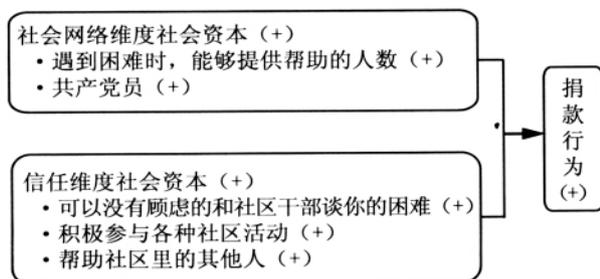


图 1 研究假设

#### (二)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

本研究利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在 2011 年建立的中国公益行为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数据为横截面数据,问卷调查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于 2011 年 8 月至 12 月在中国 27 个城市、108 个社区进行。本次调查得到家庭有效样本 5352 个(每个家庭 1 位被访者),个人有效样本 14210 个(包含被访者及其家庭成员)。抽样方法为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第一阶段是城市的抽取。综合考虑区域分布、人口规模 and 经济发展水平三个因素,按照地理位置东中西、城市规模大中小、经济发展高中低的方式在全国共抽取了 27 个城市。第二阶段是社区的抽取。在每个抽中的城市抽取老旧社区、商品房社区、单位大院和保障房社区各一个。数据收集方法为调查员入户面访。本研究使用了调查数据中家庭成员基本情况、公益行为、家庭经济与社会支持、健康状况及社区服务等方面的信息。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区居住时间、生活幸福感、自评健康状况、家庭经济状况以及社区服务等变量。

调查中有关公益行为的问题只调查了每个家庭的被访者。在 5352 位被访者中,女性占 48.84%; 1990 年代出生的“90”后占 0.87%，“80”后、“70”后、“60”后、“50”后以及 1949 年(含)之前出生的分别占 12.34%、23.92%、25.88%、18.55%、18.44%; 教育程度方面,10.01%的受访者为小学及以下,31.58%的为高中、职高、技校或中专;政治面貌方面,25.07%的为中共党员,非中共党员占 74.93%;被访者中有宗教信仰的占 7.23%,没有宗教信仰的占 92.77%;被访者的户籍类型以本市非农业为主,占到 87.39%;81.47%的被访者已婚;工作状态方面,有工作的被访者(包含正规就业和灵活就业)占 57.13%,不工作的(离退休、在校学生等)占到 42.87%。被访者的基本特征详见表 1。

#### (三)变量及测量

##### 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是否捐款”,问卷中对因变量的测量是通过设置问题“过去一年中,您是否参加过捐款活动?”被访者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回答“是”或“否”。在回答了该问题的被访者中,过去一年捐过款的有 2733 人,占 51.86%,没有捐过款的 2537 人,占 48.14%。

表1 样本基本特征描述(N=5352)

| 变量名称 | 变量取值        | 频数   | 比例(%) | 变量名称 | 变量取值  | 频数   | 比例(%) |
|------|-------------|------|-------|------|-------|------|-------|
| 性别   | 女           | 2614 | 48.84 | 户籍类型 | 本市非农业 | 4659 | 87.39 |
|      | 男           | 2738 | 51.16 |      | 外地非农业 | 252  | 4.73  |
| 年龄组  | 1990年代      | 46   | 0.87  | 本市农业 | 196   | 3.68 |       |
|      | 1980年代      | 655  | 12.34 |      | 外地农业  | 224  | 4.20  |
|      | 1970年代      | 1270 | 23.92 | 婚姻状况 | 已婚    | 4343 | 81.47 |
|      | 1960年代      | 1374 | 25.88 |      | 离婚    | 292  | 5.48  |
|      | 1950年代      | 985  | 18.55 |      | 丧偶    | 344  | 6.45  |
|      | 1949年以前     | 979  | 18.44 |      | 未婚    | 352  | 6.60  |
| 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 531  | 10.01 | 中共党员 | 是     | 1329 | 25.07 |
|      | 初中          | 1381 | 26.04 |      | 否     | 3973 | 74.93 |
|      | 高中/职高/技校/中专 | 1675 | 31.58 | 工作状态 | 正规就业  | 2538 | 47.85 |
|      | 大专          | 1033 | 19.48 |      | 不工作   | 2274 | 42.87 |
|      | 本科及以上学历     | 684  | 12.90 |      | 灵活就业  | 492  | 9.28  |
| 宗教信仰 | 有           | 387  | 7.23  |      |       |      |       |
|      | 无           | 4965 | 92.77 |      |       |      |       |

## 2. 自变量

本研究关注的自变量社会资本并非一个能够直接观测到的指标,不过,调查问卷中设置了一些反映社会资本的问题,涉及到上文中提到的衡量社会资本的几个核心维度,使社会资本测量成为可能。本文主要从社会网络和信任两个维度来描述受访者的社会资本状况。

社会网络从个人社会网络规模以及在社会关系中拥有的有价值资源测量社会资本。弗奈普将“社会网络中有意愿或有义务提供帮助的人的数量”(王卫东,2006)列为社会网络资本三要素之一。因此,我们将问卷中“如果您家遇到较大事情(急需一笔钱、孩子就业、家庭成员重病)需要帮助的时候,您家通常可以有几个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列为衡量社会网络维度社会资本的指标之一,帮助的人数越多说明该维度社会资本越强。另外,在中国当下社会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也可以作为反映社会网络维度社会资本指标的一个代理指标。胡荣(2011)以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作为因变量,考察了转型时期不同因素对网络资源的影响,发现党员的社会网络资源明显优于非党员。

信任是当前研究中通常采用的衡量社会资本的另一个维度。信任涉及到一系列个人的价值观和意识层面的内容,因此,对信任的测量更为困难。国外有研究指出,对于政府官员的信任可以被认为是人际信任的一般化体现(Brehm & Rahn, 1997)。同样,在社区中,当人们通过与社区里其他居民的友善互动或向其提供帮助,认为其他居民会对这些互动给予友善的肯定和回应,并在需要时同样对待自己时,这种互惠规范会增强人们对社区的信任(Richey, 2007)。依据上述研究发现,我们选择“你可以没有顾虑的和社区干部谈你的困难”、“你积极参与各种社区活动”、“你会帮助社区里的其他人”三个问题作为信任得分的指标。问卷中上述问题按照李克特量表的方式进行了设计,受访者的回答为“很不同意、比较不同意、一般、比较同意、完全同意”五项中的一项,上述几个选项分别赋予1分、2分、3分、4分和5分,我们用受访者上述三个问题的总得分衡量其信任维度社会资本的状况,得分越多表明其信任维度社会资本越强。

## 3. 控制变量

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态、家

家庭经济状况、生活幸福感、健康状况、在本社区的居住时间等在以往研究中已经被证明对个人捐款行为有比较显著的影响(Mesch, Rooney, Steinberg, Denton, 2006; Brown & Ferris, 2007; Borgonovi, 2008; Wang & Graddy, 2008; Einolf, 2011),因此本研究中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代入模型。其中,家庭经济状况、生活幸福感、健康状况采用被访者的自评状况,均分为三个等级。家庭经济状况分为好、维持生活和困难,生活幸福感分为幸福、一般和不幸福,健康状况分为好、一般和差。由于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比较显著,且不同家庭的各种经济负担也有所不同,使用绝对数量的家庭人均收入无法真实地反映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人们的生活水平差异,而采用自评的家庭经济状况可以较好的避免上述问题。尽管在自评的健康和生活幸福程度指标能充分地反映个体真实的健康和生活幸福程度方面仍然存在一些争议,但是大多情况下人们认为上述指标能较好地反映真实情况(Borgonovi, 2008)。因此,我们这里采用被访者自评的健康和生活幸福程度指标衡量其健康状况和生活幸福感。

#### 四、数据分析模型及结果

随着捐赠行为的影响因素成为国际学术研究的热点,一些学者对研究使用的数据分析方法也进行了讨论和反思(O'Neil, 2001; Rooney, Steinberg, Schervish, 2004)。O'Neil(2001)撰文指出,对于捐赠等公益行为的研究,应当将多元统计分析作为常规的研究方法,并应当检验统计显著性,以更为精确地描绘公益行为和社会人口特征、行为、态度等变量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使用多元回归分析方式,对其他影响因素进行控制,以便更清晰地描绘社会资本对捐赠行为的影响。Logistic回归模型是对二分类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时普遍采用的分析工具。本文的因变量“是否捐款”属于二分类定类变量,取值为0和1,因此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的统计分析软件为Stata12.0。

我们使用两个模型来分析各有关变量对捐赠行为的影响。模型1仅代入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代入了测量社会资本的有关变量。模型1的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女

性捐款的可能性高于男性;教育程度越高,居民捐款的可能性越大;已婚居民相对于离婚与丧偶的居民,有工作的居民相对于不工作或灵活就业的居民,捐款的可能性更高;在本社区中居住时间更长的居民以及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居民捐款可能性同样会增加,这些结论与国外相关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Schervish & Havens, 1997; Mesch, Rooney, Steinberg, Denton, 2006; Bekkers, 2010)。在引入测量社会资本的变量后,通过两个模型的横向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模型1当中表现显著的各变量,在模型2中仍然显著,只是在优势比的程度上有一些变化,但变量作用的方向并未发生改变。而在模型1中表现不显著的变量,除了年龄分组当中的70后变得显著以外,其他变量仍然不够显著。另外,两个模型的伪决定系数(Pseudo  $R^2$ )分别为0.11和0.12,说明在引入社会资本变量后,对因变量变化的解释能力有比较明显的提升,这说明社会资本的确是影响居民捐款行为的重要因素。

通过模型2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用来测量社会资本的三个变量:中共党员、困难时提供帮助的人数以及信任得分对居民的捐款行为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中共党员参加捐款的优势(Odds)是非中共党员的1.59倍;困难时提供帮助的人数对应的优势比(Odds Ratio)为1.05,这意味着遭遇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每增加1人,居民捐款的优势会增加5.10%。这说明社会网络越强的居民,捐款的可能性也越大。同样在模型2中我们可以看到,信任得分每增加1分,居民捐款的优势会增加6.00%,这说明居民信任得分越高,居民捐款的可能性也越大。这一结论,验证了国际文献中社会关系网络和社会信任方面的社会资本对于人们的捐款行为有正向影响这一结论(Brown & Ferris, 2007; Wang & Graddy, 2008)。

#### 五、讨论与反思

上述模型分析结果验证了我们前面提出的研究假设,中共党员的身份、遭遇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和信任得分与捐款行为均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社会网络与社会信任维度的社会资本越强,居民捐款的可能性越高。

表2 社会资本与捐赠行为关系的 Logistic 回归结果

| 自变量                    | 模型 1     |       | 模型 2     |       |
|------------------------|----------|-------|----------|-------|
|                        | 优势比(OR)  | 标准误差  | 优势比(OR)  | 标准误差  |
| 性别(以“男性”为参照类别)         | 1.394*** | 0.094 | 1.467*** | 0.107 |
| 年龄(以“1949年之前出生”为参照类别)  |          |       |          |       |
| 90后                    | 2.186**  | 0.873 | 3.122*** | 1.340 |
| 80后                    | 0.873    | 0.139 | 1.135    | 0.201 |
| 70后                    | 1.221    | 0.166 | 1.527*** | 0.230 |
| 60后                    | 1.304**  | 0.165 | 1.525*** | 0.213 |
| 50后                    | 1.160    | 0.132 | 1.271*   | 0.157 |
| 教育程度(以“小学及以下”为参照类别)    |          |       |          |       |
| 初中                     | 2.013*** | 0.270 | 1.840*** | 0.263 |
| 高中                     | 2.864*** | 0.384 | 2.384*** | 0.343 |
| 大专                     | 3.536*** | 0.520 | 2.890*** | 0.461 |
| 本科及以上                  | 5.808*** | 0.944 | 4.393*** | 0.781 |
| 婚姻状况(以“已婚”为参照类别)       |          |       |          |       |
| 离婚                     | 0.646*** | 0.094 | 0.638**  | 0.102 |
| 丧偶                     | 0.653*** | 0.096 | 0.578*** | 0.092 |
| 未婚                     | 0.926    | 0.143 | 0.941    | 0.157 |
| 工作状况(以“正规就业”为参照类别)     |          |       |          |       |
| 不工作                    | 0.435*** | 0.040 | 0.451*** | 0.045 |
| 灵活就业                   | 0.468*** | 0.053 | 0.437*** | 0.054 |
| 本社区居住时间                | 1.028*** | 0.003 | 1.027*** | 0.003 |
| 家庭经济状况(以“困难”为参照类别)     |          |       |          |       |
| 好                      | 1.462*** | 0.180 | 1.321**  | 0.179 |
| 一般                     | 1.219*   | 0.131 | 1.177    | 0.140 |
| 生活幸福感(以“不幸福”为参照类别)     |          |       |          |       |
| 幸福                     | 0.989    | 0.163 | 0.871    | 0.156 |
| 一般                     | 0.821    | 0.129 | 0.779    | 0.133 |
| 健康状况(以“健康状况差”为参照类别)    |          |       |          |       |
| 好                      | 1.004    | 0.138 | 0.928    | 0.139 |
| 一般                     | 1.392**  | 0.186 | 1.353**  | 0.197 |
| 中共党员(以“非中共党员”为参照类别)    |          |       | 1.593*** | 0.139 |
| 困难时提供帮助的人数             |          |       | 1.051*** | 0.018 |
| 信任得分                   |          |       | 1.060*** | 0.017 |
| 常数项                    | 0.267*** | 0.065 | 0.131*** | 0.041 |
| 观察值数量                  | 4750     |       | 4201     |       |
| 伪 R <sup>2</sup>       | 0.109    |       | 0.120    |       |
| Hosmer-Lemeshow 拟合优度检验 | 0.426    |       | 0.428    |       |

注: \*  $p < .1$ ; \*\*  $p < .05$ ; \*\*\*  $p < .01$

中共党员参加捐款的优势是非中共党员的1.593倍。在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共产党员比非共产党员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源(胡荣,2011),因而也就有更多机会和途径接触到各种有关捐款的信息,比如捐款的对象、捐款的渠道,当然也会有更大的可能性成为被劝募的对象,因此捐款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另外,共产党员广泛的分布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体制内的单位

中。这些体制内的单位通常会积极响应国家和社会的号召,动员职工捐款。毕向阳等的研究发现,在捐款行为方面,后单位制时代体制动员因素保持着显著的效力(毕向阳、晋军、马明洁、何江穗,2010)。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数据也显示,捐款者的第一捐款途径为“所在单位或者党组织”的占到了63.1%。由此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共产党员具有较高的捐款可能性。

遭遇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每增加1人,居民捐款的优势增加5.1%。当一个人遭遇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越多意味着其拥有较广泛的交际范围和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的建立和巩固,需要网络中的各方在对方遭遇“困难”的关键时刻或对方发出帮助“请求”时给予积极的回应。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遇到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多的居民,很有可能是拥有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平常与外界互动比较频繁的人,更有可能接触到有关捐赠的各种信息,在他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会积极的提供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包括捐款、捐物等。所以,我们会发现“遭遇困难时,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数”多的居民捐款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

社会信任得分的增加同样会提高人们捐款的可能性。本研究中,社会信任得分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包含信任社区干部、积极参与社区活动和帮助社区里的其他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社区当中,居民拥有较高的信任度,意味着人们愿意相信社区的管理者和社区其他居民,对他们的各种言行有着较高的认可度。当社区干部或社区中的其他居民组织大家参与包括捐款在内的各种社区活动时,信任度比较高的被动动员者有更大可能会积极参与。同样,人们参与社区活动和对他人施予援手的同时,也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社会网络,这种网络会反过来进一步提升信任程度,促进居民更多地参与捐款等活动。上述分析也可以外推至更大的范围,即居民对社区以外的个体和组织的信任会促使他

们积极参与到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活动中去。因此,我们也就容易理解具有较高社会信任度的居民,捐款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增加。

在数据分析中一些控制变量与捐款行为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在日后的研究中予以进一步的关注。比如在年龄方面,除80后以外,90后、70后、60后和50后与1949年之前出生的居民相比其捐款的可能性都具有显著性差异,且捐款优势比呈现出依次下降的趋势,相对年轻的人表现出更高的捐款积极性,但是为什么唯独80后这一群体缺乏显著性,这一现象值得深入研究。另外,国外有研究表明,已婚者比未婚者更有可能捐款(Mesch, Rooney, Steinberg, Denton, 2006; Einolf, 2011; Wymer, 2011),然而本研究发现,不管是否考虑社会资本相关因素的影响,已婚人士与离婚或丧偶人士相比,其捐款可能性更高,且均具有显著性,而与未婚人士相比尽管捐款可能性略高但缺乏显著性。

当前社会资本的测量尚没有一致认可的方法。我们依据社会资本领域代表性学者科尔曼和普特南等对社会资本基本理论的阐述以及国内外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的文献,从调查数据中抽取了一些能够反映社会资本的指标。尽管指标的选取有比较充分的理论依据,但是由于不是专门针对社会资本的测量设计的调查问题,所以难免不够严谨和准确。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必要围绕社会资本的测量设计更加精准的衡量指标,并对社会资本对公益行为的影响进行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包亚明(1997). 布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44.
-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慈善事业研究中心(2012). 2001—2011中国慈善发展指数报告.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毕向阳,晋军,马明洁,何江穗(2010). 单位动员的效力与限度——对我国城市居民“希望工程”捐款行为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研究(06):149—177.
- 陈茗,林志婉(2004). 城市老年人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人口学刊.(3):30—34.
- 丁元竹,江汛清,谭建光(2007). 中国志愿服务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375.
- 胡涤非(2011). 农村社会资本的结构及其测量——对帕特南社会资本理论的经验研究.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4):62—68.

- 胡荣(2011). 社会转型与网络资源.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06):111—118.
- 梁莹(2009). 社区居民的志愿精神与居民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认知:内在关联之实证解析——基于对南京市708位城乡社区居民的实证调查. 中国软科学.(10):180—192.
- 万俊毅,秦佳(2011). 社会资本的内涵、测量、功能及应用. 商业研究.(04):9—13.
- 王卫东(2006). 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本与个人资本. 社会学研究.(03):151—166.
- 尉建文,赵延东(2011). 权力还是声望?——社会资本测量的争论与验证. 社会学研究.(03):64—83.
- 夏瑛(2007).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社会资本研究.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杨雪冬(1999). 社会资本:对一种新解释范式的探索.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3):52-60.
- 张广利, 陈仕中(2006). 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瓶颈:定义及测量问题探讨. 社会科学研究, (02):107-111.
- 张网成(2011). 中国公民志愿行为研究(2011):现状、特点及政策启示.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
- 张文宏(2003). 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 社会学研究. (04):23-35.
- 赵家章(2011). 社会资本是否可以测量?——基于WVS中国数据的尝试. 经济体制改革. (04):25-28.
- Bekkers, R. (2010). Who gives what and when? A scenario study of intentions to give time and mone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9(3), 369-381.
- Borgonovi, F. (2008).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l volunteering and self-reported health and happiness.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66(11), 2321-2334.
- Brehm, J., & Rahn, W. (1997). Individual-level evidence for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social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99-1023.
- Brown, E., & Ferris, J. M. (2007). Social capital and philanthropy: An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on individual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6(1), 85-99.
- Coleman, J. S.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20.
- Einolf, C. J. (2011). Gender differences in the correlates of volunteering and charitable giv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40(6), 1092-1112.
- Mesch, D. J., Rooney, P. M., Steinberg, K. S., & Denton, B. (2006). The effects of race,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on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in Indiana.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5(4), 565-587.
- O'Neill, M. (2001). Research on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0(3), 505-514.
- Putnam, R. D., Leonardi, R., & Nanetti, R. Y. (1994).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2001). Soci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consequences.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2(1), 41-51.
- Richey, S. (2007). Manufacturing trust: community currencies and the creation of social capital. *Political Behavior*, 29(1), 69-88.
- Rooney, P., Steinberg, K., & Schervish, P. G. (2004). Methodology is destiny: The effect of survey prompts on reported levels of giving and volunteering.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3(4), 628-654.
- Schervish, P. G., & Havens, J. J. (1997).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charitable giving: A multivariate analysi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8(3), 235-260.
- Wang, L., & Graddy, E. (2008). Social capital, volunteering, and charitable giving.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19(1), 23-42.
- Wymer, W. (2011). The implications of sex differences on volunteer preferences. *Volunt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oluntary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22(4), 831-851.

(责任编辑 侯珂 责任校对 侯珂 孟大虎)

## Influencing Factors in Urban Residents' Do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apital

NAN Fang<sup>1</sup>, LUO Wei<sup>1,2</sup>

(1.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NU, Beijing 100875;

2.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Donation from the mass resident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promoting public charity cause; therefor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 urban residents' donation under macro social background may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for advancing public charity cause. The present author makes an attempt of that against the Social Capital Theory by taking the relevant data out of the representative method of sampling from the Chinese residents' public welfare behavior. It is found that the donation behavior may be affected by individuals' social capital stock under the control of such variables as sex, age, education level, marriage state, community residential time, sense of living happiness, healthy state, family economy, and communal service. To be specific, the social capital concerning social relation network and social trust have a forward function upon the donation behavior; for those who have a wid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ty and more social relations tend to donate more; and the increase of social trust will also add to the increase.

**Key words:** social capital; donation; social network; social trust